

作为“第三条道路”的俄国根基派刍议

——以费·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中心

万海松

【内容提要】 有别于同时代的斯拉夫派的和西方派，俄国根基派是独特的“第三条道路”，它在另两派思想中吸收合理的因素为己所用，批判其中它认为不适合俄国国情的主张与倾向。以作家兼思想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为中心，可以清晰地梳理根基派的产生背景与内部构成，分析俄国根基派作为“第三条道路”对彼得大帝功过、“人民性”问题和农村村社问题的看法，甄别它与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异同，达到考察俄国根基派整体的思想立场、代表人物和历史意义的目的。

【关键词】 根基派 陀思妥耶夫斯基 西方派 斯拉夫派

【作者简介】 万海松，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根基派（又称根基主义、土壤派）是19世纪中后期出现在俄国知识界的一个思想流派。根基派（почвенничество）^①源自俄文的根基（почва）^②一词。根基的引申意义有两层：第一层是指人民、老百姓、民间；第二层更高的引申意义是指俄国文化，特别是东正教文化。将根基一词引申为俄国人民和俄国文化，这种喻义在俄国文学里早已有之，屡见不鲜，但从根基一词中引申出一种比较成熟的世界观和思想流派，在俄国的知识界，还是属于19世纪60年代的一个特有现象。作为一个思想流派，根基派自诞生以来，在与其他流派或隐或显的思想论战中，其理论和阵营逐渐得到了发展和壮大。几乎从诞生之日起，根基派就已经成为俄国思想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俄国根基派从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批判斯拉夫派思想中某些陈

① 英文音译为 pochvennichestvo，还可意译为 Native - Soil - ism, native soil conservatism, Return to the Soil.

② 又译土壤、大地、乡土。

腐的观点和不切实际的因素，同时也指责西方派无视俄国现实，认为西方派企图利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某些激进思潮和盲动举措，来达到腐蚀俄国、使俄国失去独特性，并最终让俄国沦为他国和他族的臣民和奴隶的目的。根基派反对当时俄国已呈泛滥之势的虚无主义等激进主义思潮，认为这些都是非俄国固有的异己思想，主张知识分子立足于俄国本土和国情，在尊重、保护和发扬本国和本民族特色的前提下，对外来文化采取有选择的拿来主义态度，克服西方文明中已经出现的道德和精神危机，希望知识分子和贵族接近人民，团结人民，从人民那里汲取艺术的养料和生命的价值，将俄国和俄罗斯文化建设成一个可供世界各国、各民族借鉴和学习的样板。

持有这种认识或者与之思想接近的文化人，一般就可以被称为根基主义者或根基派分子（почвенник）。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根基主义者一词并非认同此思想的人的自称，而是论敌阵营赋予的一个带着强烈讥嘲意味的称号。

一 根基派的诞生背景与内部构成

根基主义思想的诞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斯拉夫派理论家看到了欧洲1848年革命的影响力和破坏力，害怕革命思想破坏俄国社会的独特性，于是便开始提倡用俄罗斯东正教来“教育社会”，也就是教育人民。然而，这些建议和倡议一直停留在书本和小圈子的清谈中，除了一些斯拉夫派流于形式的接近人民、与人民打成一片的尝试之外，大部分斯拉夫派缩进了书斋，根本没有到实践中推行理论勇气，沦为夸夸其谈的思想的巨人和行动的矮子。有些斯拉夫主义者甚至罔顾事实，认为古罗斯时期就存在法律的概念，并鼓吹俄国那时的法律规范跟农奴制解体前后的法律制度一样发达^①。但俄国境外的欧洲学术界却并未作如是观，当时一种拿俄国的落后性开涮的论调反而开始流行于欧洲文化界。其中，法国作家阿斯托尔夫·德·屈斯蒂纳侯爵写的《1839年的俄国》一书（19世纪40年代首次发表，发表后多次修订、再版）具有很大的代表性：上至沙皇尼古拉一世，下至俄国普通民众，都成了他描写和讥嘲的对象。在相当多的俄国人看来，这种调侃或嘲笑别有用心，具有强烈的仇俄论色

^① Аксаков И. С. Иван Сергеевич Аксаков в его письмах. ч. 1 - 2. в 4 т. М. : Тип. Волчанинова, 1888 - 1896. ч. 1. , т. 2. С. 247.

彩。在欧洲思想界逐渐蔓延的仇俄心理，逐渐返销俄国，进入了俄国的思想界。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呼吁知识分子爱国和爱人民（回归根基）、主张对斯拉夫主义和西方主义思想中的某些观点既有批判又有接受、兼容并蓄的第三条道路——根基主义应运而生。值得注意的是，这三派思想并非泾渭分明、油水不溶，它们之间既有分歧也有共识。

面对风云变幻的世界性事件和本国的国情，俄国思想界的部分人士看到了斯拉夫派面对西方思潮大举入侵而招架乏力的趋势，他们怀着对祖国和民族文化的爱护和忧虑，力陈斯拉夫派和西方派思想的利弊，试图化解两者的尖锐对抗，主张俄国民族特色与西方文明优秀成果的结合。持这种认识和立场的文化人，在那个时代的俄国知识界不乏其人，其中还有很多著名人物，比如作家米哈伊尔·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对知识分子脱离人民的实际状况，他抱有与根基主义思想家们同样的忧虑：“事情的实质在于，我们的知识分子和人民毫无共同之处，知识分子过去和现在的生活都与人民隔绝，他们接受外国模式的教育，还将与人民格格不入的思想和观念引入生活，总之，他们是在给我们鲜活的、完好无缺的机体注射毒药和腐蚀剂。”^①像萨尔蒂科夫-谢德林这类在思想上趋近根基派的知识分子，可以称作广义上的根基主义者。

跟斯拉夫派一样，根基派起初也是一个比较松散的思想共同体。后来，基于共同或接近的思想立场，他们先后团结在米哈伊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弟弟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创办的文学与政治月刊《时代》（Время）和《时世》（Эпоха）的周围。在这里，根基主义思想取得了共识，得到了广泛的讨论、交流和传播，并有机会得到进一步的总结与深化。在这里，根基主义思想的大理论家凭借其原创性思想开始影响到其他的杂志同仁。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一开始，在聚拢到这两个杂志之前，有些思想大家，如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其根基主义观点就已经基本形成，且几乎系自己独立提出。虽然同一旗帜下的思想家们相互之间并不一定存在明显的直接影响，但细观他们早期的根基主义思想，不难发现很多相似或相同的认识，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大体而言，《时代》和《时世》杂志是聚集和团结根基派的堡垒与阵地，而那些认同《时代》杂志在1860年发表的《〈时代〉杂志1861年征订启事》中的思想认识和文化主张，并团结

^① Салтыков - Шедрин М. 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20 тт. т. 5. М. :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57. С. 241.

在《时代》和《时世》杂志周围的文化界同仁，可以被看作狭义上的根基主义者。根基主义作为一个思想流派的追求和主张，其阵营的发展壮大，在理论上的丰富与深化，在各个艺术领域的探索，从某种角度来看，也得益于这两个杂志的阵地作用：正是通过围绕在该杂志周围的一些撰稿人所发表的文学作品、文学评论、政论时评和哲学随笔，根基主义得到了比较充分的阐释、论证和表述。

因此，一般认为，《〈时代〉杂志1861年征订启事》是根基主义者们的第一份共同纲领。这篇文章表明了根基派的基本立场，即一种介乎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之间的第三条道路。根基派认为没有必要再回到斯拉夫派所说的彼得大帝之前的俄国去，但也不反对吸收欧洲生活中对俄国的发展有价值的历史经验。根基派从当前的现实出发，看到了恢复一度被彼得大帝改革所打断的知识分子跟人民的联系希望，指出普及教育是恢复联系的第一步，主张知识分子和所有俄国人都要立足于自己的根基，完成俄国社会即将到来的大转变。在为了这两份杂志的征订和存续而撰写的《〈时代〉杂志1862年征订启事》、《〈时代〉杂志1863年征订启事》、《关于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之后〈时世〉月刊出版事宜的声明》、《关于由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家族出版的文学和政治月刊〈时世〉的出版事宜》里，根基主义思想又多次得到了重复和深化，并竭力张扬自己独树一帜的观点和立场，具备了与其他团体或流派的思想进行辩论的性质。因此，这些文本加起来才能算是根基主义作为一个思想流派的共同的思想纲领。至于发表在这两个杂志上的那些根基主义观点鲜明的文章，则可以被认为是根基派在《时代》和《时世》这两份杂志存在时期的共同思想的体现。

为根基主义思想做出贡献的主要是那些作为《时代》和《时世》杂志同仁的狭义上的根基主义者，包括出版人兼作家米哈伊尔·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家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评论家阿波罗·格里戈里耶夫、哲学家尼古拉·斯特拉霍夫、作家阿波罗·迈科夫、批评家兼诗人德米特里·阿韦尔基耶夫、作家康斯坦丁·巴比科夫、费奥多尔·别格、尼古拉·布纳科夫、米哈伊尔·弗拉季斯拉夫采夫、弗谢沃洛德·克列斯托夫斯基和阿列克谢·拉辛等人。其中，思想最突出、立场最坚定、理论贡献最大的根基主义思想家当属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格里戈里耶夫和斯特拉霍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的根基主义思想主要通过文学创作和政论的形式体现出来，他们所代表的是根基主义的文学和政论方向；格里戈里耶夫作为一名文学和文化批评家，其根基主义思想主要是通过美学和艺术评论来表达的，他代表的是根基主义思想的美学艺术方向；而作为跨越自然科

学和哲学科学的学者斯特拉霍夫，他的根基主义论述多见于其具有思辨性的文章和著作之中，因此不妨说，他代表了根基主义思想的哲学思辨方向。其中，尽管米哈伊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根基主义思想有一定的贡献，但由于他英年早逝，而且发表的作品数量有限，学界一般不把他看作是根基派的思想大家。人们通常认为，根基派的三大思想家就是费·陀思妥耶夫斯基、格里戈里耶夫和斯特拉霍夫。

尽管同属根基派，但这远不意味着这三大思想家的思想铁板一块、毫无分歧。事实表明，即使同处两个杂志的编辑部成为同事期间，这三位思想家的观点也不尽相同，往往分歧不断，且有时分歧还很严重，以至于格里戈里耶夫曾一度拂袖而去^①。根据他们各自思想的总体发展过程，以及他们在编辑部共事阶段各自发表的著述内容，我们认为，这三位正好代表了根基派中的左中右派。格里戈里耶夫代表了根基主义思想的右派（就保守的意义而言），侧重于挖掘俄国的独特性，在某种意义上说，更加靠近斯拉夫派。斯特拉霍夫代表了左派（就激进的意义而言），侧重于批判西方的学说，在批判的过程中受到西方思想的较大影响。比如，俄国哲学家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就曾指出，斯特拉霍夫在很多专著（如《俄国文学中与西方的斗争》）里实际上表现得完全像一个偏重理性的西方派思想家。“《反对西方的斗争》（即《俄国文学中与西方的斗争》的简称。——引者注）的可敬的作者在这个如此重要的和显然合乎他新意的课题（指机械论世界观。——引者注）上，不仅是一个西方主义者，而且是一个极端的和片面的西方主义者。”^②而且，斯特拉霍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个持续了终生的争吵或说分歧，那就是对理性的态度。“斯特拉霍夫认为自己 and 很多人都是‘对荒谬抱有敌意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指责斯特拉霍夫对庸常理性的追求。”^③相比之下，陀思妥耶夫斯基代表的则是中间派，他对格里戈里耶夫和斯特拉霍夫的观点既有赞同又有异议，在编辑部中也是持折中、温和的立场。我们再以三位对黑格尔的态度为例简要说明一下。在黑格尔的哲学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理性，

^① 至于他们的思想分歧，学界已有详细研究，具体可参阅：Кирпотин В. Я.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в шестидесятые годы. М.: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66; Богданов А. В. Почвенниче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 А. А. Григорьева, 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Н. Н. Страхова. М.: А. В. Воробьев, 2001; Dowler, Wayne. *Dostoevsky, Grigor'ev, and Native Soil Conservatism*.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2.

^② [俄]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俄罗斯与欧洲》，徐凤林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72页。

^③ [俄]弗拉基米尔·扎哈罗夫：《二二得几，或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明确性中尚未明确的内容》，张变革译，载《世界文学》2011年第5期。

而在谢林的哲学中，则是直觉占据主导地位。俄国思想家们对这两位德国哲学家的接受与排斥，大体能反映其思想立场。总的来说，格里戈里耶夫是一个坚定的反黑格尔派，他只在大学时期短暂地迷恋过黑格尔哲学，后来则坚决地转换到反黑格尔的立场上，“他把黑格尔的哲学理解为一种‘否定哲学’，一种完全脱离生活并依赖于‘空洞概念’的纯逻辑思维的哲学”^①。他在创作高峰期的60年代，拒斥理性主义，捍卫直觉认知。而斯特拉霍夫在哲学思想的很多方面都受到黑格尔思想的影响，俨然是一个黑格尔右派。基于这种立场，斯特拉霍夫激烈批判从黑格尔左派那里滋生出来的虚无主义，在其批驳和论战的文字中，无处不反映出他娴熟应用的理性主义论证手法。正是斯特拉霍夫思想中这种行右实左的特点，使他博得了他的老师格里戈里耶夫的好感，让他坐稳了根基主义思想左派的交椅^②。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就美学观点而言，他的主张中既有黑格尔的成分，又有谢林的成分，但总体而言，更接近谢林。在思想上，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更接近于格里戈里耶夫，也就是说更接近于斯拉夫派一些，但他的斯拉夫派味道没有格里戈里耶夫那么浓烈。在实际主编杂志的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一个努力弥合左右派观点、维持内部思想均衡的人。

根基派的出现也顺应了俄国国内外思想发展的需要。19世纪60年代是老一代斯拉夫派的代表人物逐渐隐退的时候。斯拉夫派的第一代，如伊凡·基列耶夫斯基、阿列克谢·霍米亚科夫和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在1860年之前已经相继离世，以伊凡·阿克萨科夫为代表的第二代，根据国内外发生的一些事件，对第一代观点有所修正，逐渐走向泛斯拉夫主义，靠收集斯拉夫各民族的民歌、传说等，来证明他们在种族上的亲缘和语言文字方面的亲近，试图彰显一种同处斯拉夫大家庭的共同意识。尽管斯拉夫主义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凝聚成俄罗斯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但是，斯拉夫派的派别活动到60年代中后期确实已经趋于沉寂。而作为斯拉夫派对立面的西方派，却凭借风起云涌的欧洲革命风暴，在俄国拥有越来越多的信众，人数几乎有压倒斯拉夫派的趋势。这个年代，也是源自欧洲的各种激进思潮层出不穷的时期，也是科学社会主义在理论上业已诞生、在实践上开始摸索的阶段。

从根基派诞生的历史语境可以看出，它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和民族忧患

^① Лазари, Анджей де. В кругу Федора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Почвенничество. Пер. с польск. М. В. Лескиным, Н. М. Филаговой. М.: Наука, 2004. С. 150.

^② Там же. С. 154.

意识。它担心在西方思潮，特别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对俄国社会的根基造成灾难性的破坏。他们认为，一旦俄国社会的根基被彻底破坏，那么俄国人民、俄罗斯民族和俄罗斯文化将找不到立足之地，势必遭受灭顶之灾。而俄罗斯民族在16世纪形成的、将莫斯科比作“第三罗马”的强烈的弥赛亚意识，又不容许外来文化玷污俄国的根基。在保护俄国文化上，根基派跟斯拉夫派一样，主张不但要保护根基，还要将根基的优点发扬光大，希望将俄国文化建设成一个抗衡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榜样，供世界各国学习和借鉴。

二 作为“第三条道路”的根基派的主张

根基派虽然在斯拉夫派思想的基础上诞生，但并非与斯拉夫派思想完全一致。斯拉夫派主要着眼于俄国的过去，认为俄国的未来能在过去的历史，主要是彼得大帝改革前的俄国历史里找到崛起的基点。斯拉夫派将彼得大帝之前的俄国，即所谓的“神圣罗斯”时期的历史理想化。“他们认为，在‘神圣罗斯’有和平产生大公（有别于西方暴力征服产生国王）、东正教（有别于天主教）和村社生活（有别于西欧封建制城堡生活）三大特征。这些特征保证了彼得之前的俄国历史有机的和平的发展。”^①因此，斯拉夫派代表了一部分俄国知识分子的心态，即因为要在俄国历史中寻找资源、古为今用，于是就程度不等地排斥西欧文明和否定其价值。而根基派主要着眼于俄国的未来，尽管也认为俄国的历史和文化里蕴含着抵御和抗击西方异质文化的内容和力量，但它不反对西方的科学、教育等物质文明，只是坚拒其不可避免的副产品——精神堕落（主要体现为无神论）。根基主义者不再美化斯拉夫派眼中玫瑰色的俄国历史，以务实的态度看待现实，敢于正视正在遭受腐蚀之危险的俄国根基，特别是底层人民在心灵上的腐化与堕落，知识分子在行动上的彷徨、犹豫和倒行逆施，对全体俄国人发出了响亮的警告，提出比较切实可行的建议。他们重视俄罗斯民族与生俱来的信仰和爱的力量在抵御外来文化入侵时的作用，呼吁贵族和知识分子回归根基、研究根基、从根基那里汲取养料，为让俄国文化发扬光大而发挥出自己的才干。他们反对斯拉夫派对资本主义出现之前的老欧洲文化的向往，细心观察资本主义出现后正在变化的欧洲，看到了资本主义文明在带来丰富物质的同时却导致人们道德和

^① 白晓红：《俄国斯拉夫主义》，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30页。

精神上的倒退与堕落。对流行于欧洲的对俄国的指责和讥讽，他们不仅十分反感，更对国内的“俄国的欧洲人”鄙视和摒弃自己的祖国和文化的论调深恶痛绝。他们将普希金奉为知识分子应该学习的楷模和理想，因为在他们看来，普希金作为一个俄国人，善于吸收欧洲文化的养料，浇灌本民族文化的花朵。根基派所主张的对欧洲文化的学习和借鉴，其出发点是为了发展和壮大俄国文化，使俄国和俄罗斯民族能屹立于欧洲民族之林。这是根基派对斯拉夫派和西方派采取兼容并包的折中主义立场的第三条道路。

对彼得大帝的功过是非的认定，是区分斯拉夫派和根基派的标志之一。这从根基派的中坚力量、作家兼思想家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彼得大帝的观点中可见一斑。关于彼得大帝的改革对俄国人民和俄国文化的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斯拉夫派的看法迥然相异，但又异中存同。斯拉夫派大体认为彼得大帝的改革破坏了俄国传统文化，致使俄国古风不存，所以对彼得大帝及其改革的历史功绩基本否定。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认为，斯拉夫派一味对彼得之前的俄国大唱赞歌，其实是无视历史真实，因为“在彼得之前的罗斯，特别是莫斯科时期，谎言和虚伪是够多的”^①，况且彼得大帝的改革瑕不掩瑜、功不可没，其全部事业的意义在于开拓了眼界，让俄罗斯获得了“自我意识”，即认识到俄罗斯在欧洲文明中的地位和使命；尽管彼得改革只是触及了俄国的贵族（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利益，并没有到达人民的最底层，只是使得贵族暂时脱离了人民（比如彼得大帝制定的《官秩表》的颁布），并未伤及俄国东正教文化的元气。要改造人民很困难，需要好几个世纪的时间，而彼得的毛病就在于急躁，企图毕其功于一役，结果两百年不到的时间只是触及皮毛而未伤内脏；人民只是看到改革败坏了风气，改革并没有给人民生活带来实质性的变化。因此总体上说，人民与彼得改革前毫无二致，彼得改革反而使得俄国明白了一个事实：“在自己的身上蕴藏着任何地方再也没有的珍贵财富——东正教，基督的真理，而且是事实的真理。”^②按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个说法，俄国的传统文化根本不需要斯拉夫派刻意去恢复，因为它一直完好无损地保存至今。反过来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种观点，又与斯拉夫派不承认蒙古征服俄国后给俄国带来任何影响的想法，如出一辙、几成同调。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18卷《文论》（下），白春仁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75页。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19卷《作家日记》（上），张羽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354页。

对人民和“人民性”（народность）问题的看法，区分斯拉夫派和根基派、是区分西方派与根基派的又一重要标志。根基派所指的根基，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斯拉夫派“人民性”概念中的人民，也就是除了统治阶级和贵族以外的全体人民，特别是那些将东正教文化完好无缺地保存至今的农民。他们眼中的人民就是那些保存了“人民性”的人们。但是，总体来说，早期的斯拉夫派过于美化人民或者说将人民理想化，他们有的竟然在城市里穿戴俄罗斯农民的民族服装招摇过市，以此而彰显自己的“人民性”，却在一定程度上故意忽视人民，特别是底层人民根深蒂固的惰性和缺点。而根基派却对人民有着清醒的认识，虽然对人民寄予希望，并一度将人民理想化，却没有无视或美化人民的愚昧落后的劣根性。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此方面的看法颇能代表根基派的立场。他主张要区别对待人民身上永恒的美和偶然的丑，并始终对人民怀有好感和敬意。他早期笔下的来自根基的小人物大多比较完美，比如中篇小说《涅朵奇卡·涅兹万诺娃》的同名主人公。随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社会争论和周围现实之认识的加深，他不再过于美化这些来自根基的小人物，而是尽可能立体地描绘他们，在指出他们永不泯灭的美德的同时，也用各种细节来形象而生动地表现他们的缺点，如殴妻、虐童、虐待动物、纵饮无度等。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终认为，一部分根基的缺点和堕落，并不代表整个根基或者大部分根基已经变质，因为根基的整体一直是完好的，人民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东正教文化的精神基础。他曾在《作家日记》的《论对人民的爱。必须团结人民》一文中指出：“不要根据俄国人民经常干的那些坏事判断俄国人民，而是按照他在干自己的最坏事情的时候还经常企盼的那些伟大的、神圣的事物来认识他。”^① 所以，他始终坚信人民在整体上没有变质，也不会堕落。

在“人民性”问题的认识上，根基派和斯拉夫派同大于异。总体而言，它们共同的思想核心是主张恢复在底层人民那里保存相对完好的东正教文化精神，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言，“实质上所有的人民本原全都源自东正教”^②，以东正教为旗帜来凝聚共识、团结社会。只不过根基派更倾向于实际，主张要学习欧洲的教育、科学等，将国外的优秀文化为我所用、壮我根基，并对人民的学习和拒腐拒变能力怀有充分的信心。而斯拉夫派则是无视现实，一味空洞、肤浅、形式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19卷《作家日记》（上），张羽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10页。译文对照原文有些许改动。

^② 同上，第293页。

主义地主张全盘复古，在相当程度上有开历史倒车之嫌，骨子里还是根深蒂固的对人民的不信任，尽管大多数斯拉夫派都受过程度不等的欧洲文明与文化的熏陶。在这个意义上说，主张改良的根基派可谓开明的保守主义。

当然，西方派和民主派也谈“人民性”概念，不过他们是从揭露俄国落后面的角度认识“人民性”的，在他们看来，“人民性”的价值就在于其暴露俄国自身缺陷的胆魄，在于引起人民急欲革除落后性并使俄国获得新生的激情与力量，由此，他们高度赞扬那些具有“人民性”的作品。从人民和“人民性”的角度可以看出，西方派与其他两派的出发点迥然相异，西方派完全否定俄国的历史，特别是彼得大帝改革前的落后历史。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西方派表面上热爱人民，实际上事与愿违，“仅仅是从理论上热爱人民”，因为“他们热爱的是虚构的意念和形象中的人民，热爱的是他们希望看到的那种样子的人民，实质上他们似乎从来就没有爱过人民”^①。究其实质，西方派与根基派和斯拉夫派的根本性分歧在于不认同俄国的东正教文化，因为绝大部分西方派甚至都是理想主义色彩浓烈的无神论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们主张让俄国走欧洲的道路，认为应该以教师爷的身份来教导人民，一厢情愿地以为可以使俄国和俄国人民脱离落后愚昧的苦海。

根基派虽然也曾试图恢复村社的优良传统，特别是希望重振东正教“聚和性”（*соборность*）思想的旗帜，来团结人民和上层贵族与知识分子，但实际上已经没有理由去美化已经面临瓦解之窘境的村社及其传统。在政论《关于一个新剧本》一文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既追忆村社曾发挥的良好作用，又对其病入膏肓痛心疾首：“村社会议——这就是人民的俄罗斯体制中保存下来的全部最牢固的、最重要的东西，这就是这一体制的主要的、历来就有的联系和它主要的未来的希望，——现在这种会议本身已经包含着自己的瓦解的因素，它已经病入膏肓！您会看到，在很多方面它已经只是一种形式，它的内在精神，内在的古老的真理已经摇摇欲坠——同摇摆不定的人们一起摇摇欲坠了。”^②即使知道村社有时候比农奴制还要可怕，清楚其中有妨碍经济发展的某些因素，但陀思妥耶夫斯基仍然非常期待村社里存续、孕育“某种新的、更好的、属于未来的、理想的东西的胚芽”^③，可见根基派更看重村社的传统号召力和精神因素，也就是团结在基督名义下的爱、自由和“聚和性”思想。由此，陀思妥耶夫斯基激烈批判斯拉夫派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19卷《作家日记》（上），第454页。

② 同上，第119页。

③ 同上，第414页。

和西方派把膜拜圣像看作是膜拜木板的言行，认为这些都是以凌驾于人民自诩的“老爷的”观点。“所有这些思想之所以出现在你们中间是出于对俄罗斯人民的长期蔑视，在俄罗斯有教养的人物中固执地保持着这种蔑视。”^①

当激进主义思想风靡欧俄思想界，批判俄国乃至仇俄论成为思想界的时髦之际，根基主义的主张甫一出现，势必引起强烈的反响。因此，根基派的共同纲领一发表，立刻遭到了来自革命民主主义的猛烈批驳，而保守主义阵营对根基派思想主张起先则不以为然，有点无视甚至蔑视，尽管后期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和解”思想又深以为然。

1861年，文学评论家马克西姆·安东诺维奇在《现代人》杂志第12期上发表了《论根基：并非农业学意义上的，而是符合〈时代〉精神的》一文。安东诺维奇指出，《时代》杂志所提出的“回到根基”的说法，并不是什么新鲜东西，无非是被斯拉夫派奉为圭臬的“人民性”概念的变体。从提出“人民性”到现在，斯拉夫派根本没有解决“人民性”的问题，也没有解释清楚这一概念到底是什么意思。因此，在他看来，“人民性”本身就是一个空洞之词，围绕“人民性”的争论只能归结为这样一些问题：“没有同情的态度能否理解俄国文学？普希金是不是人民诗人？克瓦斯是不是比水更好的饮料？”^②而现在，作为斯拉夫派志同道合者的《时代》杂志同仁提出“根基”的概念，不过是替换“人民性”概念，可想而知，这一新概念势必还将落入“人民性”空洞无物的窠臼。他指出，那些认为俄国“根基”在思想特色方面迥异于西欧的人，已经陷入了深刻的迷误之中。安东诺维奇反对那些“并非农业学意义上的，而是符合《时代》精神的”所谓“充当和事佬的根基主义者”过于拔高俄国和俄罗斯民族的独特性，指责他们为“接近人民”所采取的普及教育的举措打着民族统一的旗号，其实不过是浪漫主义的幻想而已。鉴于此，安东诺维奇呼吁：“那些为给人民扫盲和接近根基而操心的人，同时也应该操心一下如何提高人民的外部生活条件和改善人民的物质福利。”^③

就在根基派作为一个思想团体刚刚提出正式的共同主张，希望通过创办文学与时评杂志，倡导普及教育，关注现实并解决实际问题等举措，来弥合人民和知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19卷《作家日记》（上），第290~291页。

② Антонович М. А. О почве (не в агрономическом смысле, а в духе «Времени») // Избранные статьи. Философия. Критика. Полемика. Л.: Гослитгиздат, 1938. С. 356.

③ Там же. С. 374.

识分子分裂已久的心灵鸿沟时，斯拉夫派却在自己的刊物《俄罗斯座谈会》和《日报》等上宣扬“教育和文学的虚伪论”：“尽是虚伪！教育里是虚伪，这纯是徒有其表的教育，没有任何的主动性，没有创造。艺术中的灵感是虚伪的……文学是虚伪的……崇拜自由同样是虚伪的……宗教精神和宗教信仰中也有虚伪……我们社会所炫示的远非常见的讲人道、有文化，都是虚伪。”^①这种打倒一切的“虚伪论”实质上是一种否定论，否定教育与文化等的教化作用。这立即引起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反感，据此他认为斯拉夫派不愿正视俄国现实。“斯拉夫主义者有一种难得的本领，就是认不出自己人，对当代现实一窍不通。只看到坏的一面，这比什么都看不见还坏。”^②陀思妥耶夫斯基还认为，斯拉夫派故步自封，并以此为荣，因此，在知识分子与人民结合、在用根基解救自己的道路上，“斯拉夫主义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或许甚至毫无作用”^③。在作为保守主义阵营的老一代斯拉夫派代表人物的逐渐逝去，以伊凡·阿克萨科夫为首的新一代斯拉夫派，虽然经过或多或少的探索，但理论发展上鲜有明显的思想建树，眼光依然无法突破老一代斯拉夫派的户牖之见。值得深思的是，在根基派思想达到顶峰之时，后期的斯拉夫派实际上有在其后亦步亦趋之嫌。尤其是随着姐姐薇拉·阿克萨科娃和尤里·萨马林的去世，伊凡·阿克萨科夫成为斯拉夫派中唯一勤勤恳恳的光杆司令后，他从早期敢于自我探索、重视实际调研的积极态度上有较大倒退，从不轻易认同哥哥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和伊凡·基列耶夫斯基的思想，转而基本认同老一代斯拉夫派的观点，并将宣扬与传播他们的思想当作己任。有鉴于此，“历史传统无不根据地将他认定为真正的斯拉夫派，——并且也是最后一个斯拉夫主义者。”^④

在莫斯科的普希金纪念仪式上，伊凡·阿克萨科夫在现场亲耳聆听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普希金”演讲，深表赞同、深受感动，等他一演讲完，就跑向发言的舞台，向听众宣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发言“不仅仅是一篇发言，而且是有历史意义的事件”^⑤。无独有偶，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普希金”演讲，著名的斯拉夫

① 转引自《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17卷《文论》（上），白春仁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33页。

② 同上，第234页。

③ 同上，第236页。

④ Каплин А. Д. Славянофилы, их сподвижники и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и. М.: Институт рус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2011. С. 320.

⑤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22卷《书信集》（下），郑文樾、朱逸森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197页。

主义者阿·伊·科什廖夫也曾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种沉重的、模糊的、然而难受的心情沉痛”时刻说的话，“浸透了心灵的痛楚和精神上的哀伤，指明了，尽管是非常克制地、又不完全正确地指明了它的原因和根源，但是唤起了疗救的希望（至少在将来是如此），对听众产生了也不可能不产生强烈的振奋作用”^①。可见，对于根基派，斯拉夫派由早期的无视甚至蔑视，转向了后期的肯定与重视。

三 根基派的影响与意义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普希金”演讲后不久就遽然离世，来不及创作出《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第二部，并将根基主义思想作进一步理论总结和艺术阐发，留下莫大的遗憾。但在社会思想的历史长河中，根基主义并未随着几个理论家的去世而成为过眼烟云，它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争论，至今仍然以各种方式和形态出现在俄国的思想界，在目前层出不穷的俄罗斯思想中依然可以找到它的影子，它还是现在很多俄罗斯思想家常常借用的思想资源。比如，根基主义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促成了俄国民粹派的出现与发展。在俄罗斯白银时代，越来越多的思想家认同根基主义这种第三条道路的合理性，譬如宗教思想家别尔嘉耶夫，他晚年开始同时批判斯拉夫主义和西方主义，并重提根基主义声明的俄国负有向全世界说出自己新话语的使命之类的主张。“斯拉夫主义的终结也同样是西方主义的终结，是东方和西方队里本身的终结。而在西方主义中有割据主义和地方主义，没有普世精神。俄罗斯自我意识既不可能是斯拉夫主义的，也不可能是西方主义的。”^② 苏联末期在俄罗斯文学中出现的“乡村散文”流派，其思想渊源也可追溯到根基主义。苏联解体后，根基主义发展到现在，在俄罗斯已经有了自己的变体，比如所谓“极端的根基主义”^③。

为什么根基主义具有如此强劲的生命力呢？首先，根基主义观点中无处不在的民族主义色彩，能引起俄国知识分子的共鸣，不管是在它刚刚出现的时候，还是在

^① [俄]阿·伊·科什廖夫：《评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普希金纪念会上的讲话》，载《俄国思想》1880年第10期，第1页。转引自格·伊·乌斯宾斯基：《普希金的纪念活动（1880年6月发自莫斯科的信）》，载[俄]阿·谢·多利宁编：《同时代人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翁文达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27页注^①。

^② 转引自[俄]津科夫斯基：《俄国思想家与欧洲》，徐文静译，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220页。

^③ Блехер Л. И., Любарский Г. Ю. Главный спор: От западников и славянофилов до глобализма и Нового Средневековья. М.: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й Проект; Институт Фонда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мнение», 2003. С. 419 ~ 422.

涉及俄国文化和外来文化之关系的年代里。根基派高呼的力争让俄罗斯民族屹立于欧洲民族之林的口号，也非常契合俄罗斯东正教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弥赛亚意识和普世精神。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大胆断言：“我敢于设想，俄罗斯能够对未来的人类的新生活做出贡献，因为俄罗斯有可靠的保证，这就是它的人民性因素，亦即东正教。”^① 其次，根基派倡导回归传统，再次团结在基督名下，提倡爱和自由以及“聚和性”思想。这种提法较有民意基础，也更具号召力和亲和力。“真正的爱只有在自由中才是可能的，只有作为对人的自由的爱才是可能的。这里呈现出一种牢固的联系：通过自由的爱和通过爱的自由。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这就是聚和性的秘密，团结的秘密，教会的秘密，——这是在基督里团结和爱的教会。”^② 再次，根基派关注现实、面向未来的务实态度决定了它具有持久的生命力。根基派热衷于关注发生在身边的新闻，不论是文化界还是市民阶层的，也不论是发生在都城的还是发生在外省的，在这些看似毫无关联的事件和现象中，他们善于发现一些具有共性的问题的普遍意义，对这类问题的积极意义和即将导致的危害程度洞若观火。虽然根基派与斯拉夫派和西方派都着眼于民生发展与国家前途，但根基派与其他两派的区别在于：根基派在各种论争中始终关心民瘼、问计于民，表现出一副务实者的面貌，属于从实际中来、到实际中去的现实主义者，而其他两派都是不切实际、不相上下的理想主义者。复古的保守主义和激进的革命主义，终究不适合俄国的国情与现实，尽管他们都出于忧国忧民之公心。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不管是理想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只要大公无私、为人正直，他们的本质都是相同的，那就是“对人类的爱”；他们表面上众说纷纭，其实殊途同归，因此，“理想主义实质上如同现实主义一样，是现实的，永远不可能从世界上销声匿迹”^③。

可以说，对国家历史和文化的尊重，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忧虑，对外来文化的包容和借鉴，呼吁知识分子关注现实、回归根基的迫切之心，对弘扬祖国文化的热切渴望，都是根基主义积极的历史意义，也是它具有强劲生命力的原因。当然，倘若过分夸大本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封闭型，走向极端的民族主义，甚至极具进攻性意味时，就属于根基主义的消极面，应予批判。

（责任编辑 张昊琦）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19卷《作家日记》（上），第363页。译文对照原文有些许改动。

② [俄]格奥尔基·弗洛罗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主题》，张百春译，载《世界文学》2011年第5期。

③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19卷《作家日记》（上），第384~385页。